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第 12 期（总第 420 期）

2024 年 12 月 5 日

-
- ◆ 中国农业保险现状及未来发展·····陈锡文（1）
 - ◆ 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新着力点·····蔡 昉（5）
 - ◆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面临的困境与对策·····辛 贤（8）
 - ◆ 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信·····郭书田（11）
 - ◆ 重温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赵树凯（14）
 - ◆ 促进农民增收应成为重大制度安排·····张红宇（17）
 - ◆ 释放农业绿色发展新动能·····金书秦（20）
 - ◆ 生计，生境，生活·····段 颖（23）
 - ◆ “忆旧养生”使我们重现青春活力·····孙鸿良（26）
 - ◆ 黑龙江养生村，地里全是活了几百万年的神奇药植，太低调·····超级乡村研究员（30）

中国农业保险现状及未来发展

陈锡文

随着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视野不断拓宽。在世界各国来讲，中国的农业保险方面，特别是在有分量的大国中可以说还是一个新起步的国家，真正实现农业农村保险时间并不太长，积累的经验有限。所以怎么能够进一步深化？这个也是当前迫切需要的。一个拓面，一个深化，这是当前农业保险业应该考虑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从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战略是伴随着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一并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保险确实能找到很多渠道，需要去关注，需要去支持，需要去帮助的点、面和整个的乡村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另外一方面，农业保险从国家来讲，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农产品供给，保证 14 亿人食物供给链的安全，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跟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应对外部风险来说这都是非常重的方面。从这个领域去讲，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保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稳定持续供应，这方面还是要作为农业保险的重点领域给予高度关注，并且不断创新。

从农产品、农业保险这个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农业生产总体对保险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从近些年农业快速发展的实践能看到有几个特点表现的非常明显：一是农业产业中的资产积累速度极快，资产规模达到较高水平。包括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大量的设施化的大棚，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设施增长的非常快，再包括农业各种各样的机械，无人机等，农业资产增长速度快，资产规模大，对安全的要求就会越高；二是从近些年中央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来，产业链的延长速度也非常快。由于产业链延长，除了农业生产，仓储、加工、运输、营销等这方面的投入和规模都在快速增长，这将为农业保险带来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及更高的要求；三是从资金资产的角度看，农业每个周期的投入量也在不断增长。比如农业生产质量，要绿色生产，减量化等，但是价格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新的投入也在不断产生。另外，对农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投入资金量也是非常快；四是农民对收入增长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从以上几个角度来讲，农业本身对于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第二，农业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近期在我国提到农业风险很自然地讲到猪的问题，猪周期是必然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更大的国际范围内也很少出现像这次这么大的波动。去年的猪肉产量 4200 多万吨，和最高的 2014 年、2015 年相比，猪肉产量降了 30%，这么大的波动也是很少见到，为什么会这样？这次这么大的波动是什么原因？业界还有比较大的争论。有的认为是生态原因，有的则认为是防疫问题。如果是猪瘟的话，当然主要是自然界的风险。但这次的大波动到底属于什么样的风险？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去应对？需要深入研究。

再一个是河南大水灾，涉及范围还不止河南。最近反复讲极端性气候的变化在增加，对农业来讲是很大的风险。自然风险在不断提高，第二个市场风险，由于投入大，产品产出规模增多，积累了相当的市场风险。无论是猪肉，还是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既有自然方面带来的风险，也有生产者对市场分析研究的不够，与需求结合的不紧密带来的一些风险。

资源部公布了第三次国土调查的资料，耕地减少的部分相当大的比例是转为林地和园地，园地一个是果园，水果的问题，第二个是茶园，茶叶的问题。结构调整到现在的时间也不长，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很多地方都感觉到有必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于是耕地转为其他用途，数量大了带来市场供给的变化。从市场分析的角度看，今年水果的销售状况不好，很多地方的价格是下降的。现在进入盛果期，各地水平都差不多，猕猴桃、葡萄，南方还有一些南果，北方有大枣、核桃。一进入盛产期，市场就无法承受。按照统计年鉴每年统计出来的茶园面积，资源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土调查中的茶园面积大概只相当于 07、08 年的面积，2020 年统计年鉴中显示，截至 2019 年茶园面积是 4200 多万亩。最近，茶叶主销部门开始积压绿茶，销售难度较大，跟快速扩张有关。要想规避市场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生产者自己要清醒，但是生产者恰恰信息不对称，只知道调整结构、扩大生产，于是积累了较高的市场风险。

第三，政策风险。党和国家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会广泛征求意见，但是政策的变化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尤其对国际市场的反映和变化。比如过去的粮油生产，国家在这方面有多种多样的政策，其中之一便是储备条件。这几年储备猪肉发挥了一点点作用，但毕竟还是有限的。再比如说粮食市场的波动，储备粮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玉米储备没有了，从中储粮的角度来看，现在市价高，玉米的价格比小麦高，小麦的价格、稻谷的价格已经高于最低收购价了，这个情况下中储粮就不能收了，财政部也不会允许在这么高的情况下收。同时，今年玉米产量未知，明年是否能够满足玉米需求，如果出现问题，除了进口没有别的手段。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亟需关注到规模大了，水平高了，产量多了，与此同时面临的市场风险、政策风险都在加大。农业保险工作主要是市场行为的工作，但是必须紧密结合实际形势认真进行研究，才能做得更好。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加，农民的期望又高了，农民对保险会有更高的要求。对保险来说也会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怎么去做好它？这是当前要认真研究的一个方面。

除了刚才讲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之外，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从 2018 年一号文件就提出了对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实行全成本保险，最近提出逐步转向农民收入保险。今年 6 月份总理去东北视察完了回来，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加快推进稻谷、小麦的全成本保险和玉米生产的收入保险，面对这么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农民或者说对种粮的农民进行保险，才能真正化解风险，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比如全成本保险，除了物化成本之外，还有劳动投入，还包括地租。地租近几年涨的非常快，根据各地调查显示，大多数地租率都在 50% 以上。例如东北政策之前和之后都有这个问题，14 年、15 年一公顷玉米大概是两万块钱的毛收入，地租就是一万块钱，就是 50%，现在价格又增加了。这些问题到底怎么去研究处理？应该保哪些，哪些是不能保的，可能还需要很深入地研究。

随着国务院 6 月份部署稻谷、小麦的全成本保险和玉米收入保险提出之后，国务院考虑到今年猪肉饲料价格上涨比较快，专门给种粮农民 200 亿补贴，这个补贴对农民的行为会有什么变化，对保险有什

么影响，这个事需要研究。这 200 亿给谁是很大的问题，是给土地承包者？还是给粮食的生产经营者？这个争论很厉害。国家对粮食进行直接补贴之后，十七八年了，一直在争论，应该给谁？应该给土地承包者？还是应该给转入土地的经营者？这个事本来是市场问题。经过反复调查，如果一定要把这个补贴补给转入土地的经营者，那么承包者一定把地租提起来，要给了承包者，可能地租的变化就均匀了。

从国内情况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各种各样的资金投入，有的变成资产，有的变成农民的收入，还有的变成其他促进农业发展的各种东西，它对保险到底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方面。

此外，还要研究国家财政出了这么大的力，通过现有的渠道支持农业，如果把这些手段和保险业结合的更好的话，能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最关键要研究的大问题。若将 200 亿直接发给农民，农民间的争论不断，承保者与经营者也将面临困境。若转为保险，其能发挥多大的杠杆作用？下一步亟需理清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中，农业保险应该站在什么地位，起着什么作用。

第四，从国际形势来看迫切需要农业保险加快转型升级。WTO 的规则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中，对黄箱补贴是有限制的。现在基本上我国的黄箱也已经用满了，即将面临再补贴遭到起诉与不补贴农民丧失积极性的问题。而现在又出现对农业升级保护政策的大挑战，加入 WTO 就意味着必须开放市场，包括农产品市场必须开放，但是由于国标不统一，发展中国家市场是可以开放的，但是是有限开放，于是我国对进口重要农产品采取的是关税配额制。关税配额制度对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国五大产品有关税配额，三大谷物也是有配额的，还有糖和棉花。糖和棉花缺口太大，设了配额，但下一步面临很突出的问题，稻谷、小麦、玉米的事怎么办？美国人一直觉得应该提高关税配额，或者应该放弃关税配额，我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一直没有这样做。

在如今农业上有很多复杂问题的情况下，这几年粮食总产量年年创新高，但是进口也年年创新高，过去这三大谷物进口至少没有突破配额，但是去年开始就突破了，玉米去年进口了 1200 万吨，承诺的关税配额玉米只有 720 万吨，已经超了这么多，那小麦和大米的配额怎么办？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二十多年前已经开始考虑，通过很重要的一个保险转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关贸总协定往 WTO 转时，对世贸组织有个设计，就是农业补贴的问题，到底能补贴多少？我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谈了很长时间，后面关贸总协定变成世贸组织了。最开始提出来农业的黄箱补贴只能是产成的 5%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 10%，谈判加入时期，我国被禁止用 10%，而用 8.5%。8.5%的补贴率不仅是对农业总产值的补贴 8.5%，而且对每个具体的农作物补贴，而现在三大谷物补贴都已经超过了。97、98 年在日本访问时，农业专家谈的几乎都是加入 WTO 的农业补贴问题，因为有限制，发达国家都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都在研究农业支持保险政策的转型，而最重要的就是把黄箱补贴不仅是往绿箱转，更主要是转到农民收入保险方面，那么就摆脱了黄箱制约。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下一步的农业保险转型升级，一是形势很迫切，二是要敢于去碰那些不熟悉的地方，碰中国作为农业农民大国碰不了的地方。从 1986 年一号文件停了十八年后，2004 年又开始发一号文件出台三大政策，进一步减免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对稻谷、小麦一些重要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同时出台三大政策。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不赞成，认为有这么多农民怎么补贴得起？从现在来看，如果那时候不对农民进行补贴，不对农业进行保护支持的话，这二十多年农业可能根本发展不起来。

中央也反复提了几次向农民的收入保险的转法，怎么转既符合国情也符合 WTO 的要求，这是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在这些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大量投入资金的大背景下，怎么能让它发挥更好的作用？政府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怎么能结合好？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

从当前这个形势变化来看有几点认识：第一，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农业保险转型升级，大大提高。第三，我国是有这个条件的，因为政府已经拿了这么多钱支持农业，无非是要研究用什么方式支持更好，更有效。把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下一步我们的研究或公司计划都将能加速往前推进的步伐。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发展委员会主任。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2 年第 1 期）

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新着力点

蔡 昉

一、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与这三个着力点密切相关：

第一，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全会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第二，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全会特别提到了“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过去有人曾提出发放一次性现金来刺激消费，这种短期举措虽然可能有效，但其效果也仅限于短期。相比之下，建立长效机制则是通过制度建设，长期稳定地推动消费增长，同时在短期内也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完善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就业问题涉及家庭和劳动者，影响居民消费。虽然疫情的影响逐渐消退，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轨道，宏观意义上的充分就业状态得以恢复，但由于结构性就业矛盾，当前的自然失业率可能较以往更高。因此，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不仅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还将产生长期的效果。

第四，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就业岗位。不仅要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需求，还要为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当前的焦点在于中国经济如何尽快回到应有的轨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轨道并非过去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状态。在 2012 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中高速增长。只要我们能维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即便是中高速增长的中后段，我们依然处于赶超状态，这也意味着我们在 2035 年实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能力，即通过要素增长与配置、提升生产率在常态下可以维持的增长速度，我们称之为潜在增长率。根据我们的测算，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是仍然能够满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速度要求。由于疫情带来的冲击，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能力之间出现了差距。潜在增长率代表供给侧的能力，即经济的基本面和韧性；而实际增长率则反映了需求侧的状况，反映是否有足够的需求来支撑经济增长。从两者之间区别的趋势来看，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可能性。因此，采取措施消除这一不应有的差别，核心在于突破需求侧的制约。传统的“三驾马车”中，外需由于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逆全球化趋势，已不可持续；投资，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工业企业，虽然仍然重要，但其作用也受到消费需求的限制，不再像过去那样强劲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根本上还是要依靠与民生相一致的消费需求，这是经济增长最可持续的拉动力。

二、政策施力和瞄准对象从投资者及企业转向家庭

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着眼于降低贷款门槛、改善营商环境、放松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甚至直

接对企业进行补贴。虽然这些政策在产业层面仍可存在，将来遇到宏观经济冲击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解决当前的宏观经济困难，应该更加注重居民消费，所以实施方式应该转变为“家庭本位”导向。“家庭本位”在当前至关重要，因为疫情期间家庭收入和就业受到严重冲击，需要短期补贴支持，但更应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

中国面临着“双新常态”的叠加。一方面，自 2012 年以来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供给侧增长能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自 2021 年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22 年人口开始负增长以来，无论是老年人口消费能力弱和消费意愿低，还是总人口减少导致消费者数量绝对减少，都潜在导致未来居民消费减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因此，在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作用下，政策的重点应转向家庭消费，我们称其为“家庭本位”。“家庭本位”的核心在于解决疫情冲击带来的“疤痕效应”，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人口负增长的长期不利效应。在这一背景下，家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不仅在于刺激消费，还在于鼓励生育。因此，转向“家庭本位”应该成为一个政策着力点。

三、政策基准从菲利普斯曲线转向贝弗里奇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取舍关系，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需求侧遭遇冲击时，通过实施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推动经济回归正常增长轨道，实现充分就业，即消除周期性失业。这种思路仍然有效。当前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回归常态，即充分就业水平。然而，相比历史水平，自然失业率有所上升，这反映了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剧。首先，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有所减弱。其次，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得新岗位的创造速度难以抵消就业的损失速度。此外，一些体制机制因素也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这些都决定了政策必须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因此，我们就要应用贝弗里奇曲线所揭示的自然失业率形成的原因，然后来应对它。

根据测算，中国的自然失业率趋向于缓慢上升。尽管实际失业率存在周期性波动，但长期来看，失业率的上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这与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加速和人口老龄化以及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无论是周期性失业还是自然失业，都代表着劳动力资源的未充分利用，这不仅是供给侧的损失，也是需求侧的损失。因此，必须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来解决自然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需要引入应对自然失业的手段，充实现有政策手段，并打通各类政策之间的联系。

自然失业率问题与体制和制度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一条就是户籍制度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过去，人们以为户籍制度主要影响农民工群体，但实际上它的影响远超这一人群范围。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城镇常住人口中，约 38% 的人口没有本地户籍，而年轻人口中这一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不仅涉及农民工，还包括大学毕业生、复转军人等，这些都是党的三中全会所重点关注的人群。为这些群体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固然是有益的且必要的做法，但更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不仅能在长期内产生积极影响，还能立即带来实际的改革红利。从供给侧改革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百万级新增劳动者；从需求侧来看，可以带动万亿级的新消费需求。

四、重新定义人口红利，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

在人口发展新常态下，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人口红利。从传统定义来看，人口红利通常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比高，抚养比低，因而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改善快、资本回报率高，以及劳动生产

率高的优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这时候我们应该把关注的人口群体放到更高年龄段上。例如，1980 年，规模最大的劳动力主要在年轻人群；到 2000 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年龄的年龄重心即开始增大；2021 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年龄更大的劳动力群体进一步集中到大龄人群；预计到 2032 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必须挖掘更大年龄的劳动力群体。总的趋势就是，政策关注点应逐渐转向规模逐渐变大、年龄逐步提高的人口群体。一方面，这些群体可以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加以利用；另一方面，人口红利的概念也可以扩展到需求侧，将老年人口转化为有效的消费者群体，也是一种伴随人口老龄化而出现的新人口红利。

在政策上我们已经部署了“银发经济”发展，并且在概念上尝试重新定义和扩大“人口红利”的内涵。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银发经济”可能带来的照护产业扩张。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全部时间中，中国妇女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占比略微超过 10%，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显著更高。然而，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却是全球最高的，这意味着她们不仅承担与其他国家妇女相似的家务劳动量，还是在就业之外承担这些家务。

这种情况导致妇女的收入水平和就业质量难以提升，同时她们也缺乏时间进行自我提升（如人力资本培养）、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如果我们将这些家务劳动转化为产业，使之成为社会化的服务供给，将产生以下几重效果：第一，提高劳动参与率。这既能直接提升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还通过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就业岗位，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从而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第二，扩大社会服务供给，增加 GDP 总量。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个人劳动属于无报酬劳动，也就不计入 GDP。如果将这些家务劳动转化为社会化供给，将显著扩大 GDP 规模。第三，改善家庭发展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平衡性，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全社会生育率。

（作者：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来源：整理于 CMF 季度论坛（2024 年第三季度）上的发言）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辛 贤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只有发挥小农户生产的优势，弥补小农户在生产经营上的弱点，保护小农户的基本利益，才能促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充分融合，更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为了解当前我国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情况，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于 2017 年暑假和 2018 年寒假期间组织师生对十二个粮食主产省（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和广西）和三个非主产省（浙江、甘肃和山西）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涉及 214 个行政村，共获得 4200 余份农户问卷及 300 余份访谈资料。

调研发现，当前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现实困境，只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才能解决农村内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才有可能不拖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后腿。

一、当前小农户农业经营的基本问题

（一）小农户普遍反映种地不挣钱，不愿意种地。绝大多数小农户都表示知道了国家要下大力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是小农户普遍反映“国家重视是好事，但好光景离自己太远了”。存在这种心态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普遍感觉“种地不挣钱”。这种情况无论是在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都很明显。以粮食主产区为例，根据我们测算，在黑龙江和吉林等一季作区，若不考虑地租和人工成本，小农户种植玉米每亩可获得利润约 300 元，种植水稻可获得利润约 1000 元；但如果再将地租考虑在内，种植玉米则出现亏损，种植水稻的利润也仅有 500-700 元左右；若再考虑 300-500 元左右的人工成本，小农户就基本就无利可图了。在两季作区，仍然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例，若不考虑地租和人工成本，小农户可获得利润分别为：山东 1137 元、河北 981 元、河南 937 元、安徽 846 元、江苏 766 元；若将地租考虑在内，则种植利润分别为：山东 597 元、河北 314 元、河南 384 元、安徽 3 元、江苏 41 元；若再将人工成本考虑在内，农户仅有微小利润甚至亏损。

在非粮食主产区，以甘肃葵花种植户为例，一年种一季，一亩地产量 300 斤（好的年景产量 500 斤左右），一斤卖 2 元，一亩地毛收入 600 元。投入种苗平均费用 120 元/亩，化肥 150 元/亩，农膜 60 元/亩，农药 40 元/亩，水电及灌溉 210 元/亩，机械作业（主要是耕地和收获）200 元/亩等，这些成本已经达到 780 元，入不敷出，还不包农民自身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成本。因此，农民普遍存在“其实我们都不愿意种地了，不挣钱”的感受。

（二）土地流转心态复杂，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从调研情况来看，小农户对于土地流转的态度主要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即使不挣钱也不愿意流转，一种是非常愿意流转。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当地机械化程度较高，小农户大多将耕地和收获环节外包，其余环节自己完成，只有实在无法种植的情况才选择流转。虽然小农户普遍反映种地不赚钱，但仍感觉自己种要比承包出去只收地租强，心里也踏实，因此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此外，部分农民把土地视为养老保障的主要来源，不敢流转、不愿流转、不肯流转。即使有了其他收入来源，宁愿粗放经营自己的责任田也不愿流转家中的土地。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农业更为发达的北方部分地区，小农户对于土地流转态度较积极，对转入土地的需求也比较旺盛。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53%的大户打算在三年内继续扩大规模，10.7%小户也打算在三年内扩大经营规模，这说明转入土地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烈。但是，小农户普遍存在地块分散的情况，一家5-6块地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导致流转困难和不彻底，所以造成了“大户要地要不着，小户想租租不出去”的两难境地。此外，根据我们的调研，从最近五年的情况来看，全国新型经营主体盈利者的比例不到七成，只有67.8%，32.2%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中处于亏损状态，数量接近1/3。因为亏损而经营不下去的大户频繁出现“跑路”现象，尤其是从外乡到本地的大户，出租土地的农户拿不到租金，又经常错过农时，于是开始又对土地流转产生抵触心理。

（三）小农户对机械服务的需求基本已经满足，对其他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整体需求较低。从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对机械服务的需求基本已经满足，尤其是在耕地和收获两大环节，如在北方平原地区，无论大户还是小农，大宗粮食作物的种收环节基本已经实现机械化。当地提供机械服务的主体既有专门从事机械化耕收的个体，也有已购置机械的大户、合作社等。

而在除耕地和收获以外的其他环节，小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普遍较低。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土地地块不大，种苗和农资购买、播种、植保、晾晒等完全可以通过一家之力或邻里间互帮互助完成，所以对这些环节的大规模、跨区域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很低。在安徽、四川、浙江等地，每户只有大约3-5亩地，小农户都可以自己干，而不需要购买专门的服务；有些山地、丘陵地带也影响社会化服务的推广。例如，在四川大巴山区，小农户听说过的社会化服务仅有收割和化肥购买两项，其余社会化服务的内容甚至从未有所耳闻。

二是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成本高。根据我们调研数据的推算，如果小农户购买耕种收环节全套社会化服务，每亩成本将达到600元，大大压缩了小农户的利润空间。因此对于普通小农户而言，即便社会化服务供给条件齐全，但由于购买社会化服务带来的节支增收效益没有吸引力，他们额外付费购买这些服务的意愿自然不高。

三是由于大宗粮食作物对于种植技术的要求不高，进入行业的门槛低，农户依靠自身已有的种植经验即可生产经营，所以对新品种、新农资、新技术的需求也普遍较低。

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尽管小农户对产前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需求低，但是他们的需求仍然难以得到满足。其中，在产前环节，小农户对介绍贷款、信用证明、信贷担保方面的满足率分别只有33.9%、34.4%、35.6%，均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大户在这三方面的需求满足程度分别为70.7%、77.1%和71.8%，均超过了三分之二。在产后环节，小农户需求满足程度较低的分别为市场信息、晾晒烘干及粮食仓储服务，满足率分别只有30.1%、34.9%和45.7%，而大户在这三方面的满足率分别达到65.2%、50.0%和62.5%。

（四）大户普遍不愿意帮助和扶持小农户。在目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农和大户之间存在直接利益冲突。调研发现，这种竞争关系使得部分大农户不愿意在生产经营中对周围小农户积极予以扶持和帮助，对自家的技术和购销渠道普遍有所保留，大户普遍存在“帮助别人富裕会使自己变穷”的思想。小农户对此也表示普遍理解，说“换成我是大户，我也会这样干”。

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政策建议

我国小农户家庭经营小而散的问题突出，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应该积极挖掘小农户的潜力，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

第一，在鼓励农业规模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一定要给小规模户创造更加积极有利的发展机会。调研结果表明，近几年地方政府在鼓励农业规模化发展过程中，普遍采取了偏向大户发展的政策支持，频频出现各种支持“垒大户”的现象，不但没有给小规模户创造更加积极有利的发展机会，反而造成更多发展机会不均等问题，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调研结果看，规模户与小农户之间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全国范围内大农户和小农户的年收入差距普遍超过了3：1，部分地区达到了4.5：1。从我们近6年的调研情况来看，随着大户农业经营规模的上升，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数量都显著高于小农户，意味着发展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大户与小户之间收入差距正在持续拉大，形成农村内部新的不均衡。

目前，各地农业补贴政策明显倾向于较大规模的经营主体，形成了大农户和小农户事实上的不平等。建议国家和相关部门出台系列专门扶持小农的政策措施。

第二，支持和鼓励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更新土地承包合同。针对农户土地细碎化影响流转的问题，国家和地方应鼓励和支持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互换承包地，在农户范围内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并颁发新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确保互换土地后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促进小农户土地流转。

第三，拓宽针对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范围和形式，刺激小农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社会化服务在辐射普通农户时存在地块不连片、不规则，种植产品不一致等问题，许多社会化服务难以对零散的普通农户开展，比如在一些丘陵地区，田间路系、水系等基础设施未达到完全机械化的要求，一些土地无法接受农业机械化服务，所以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部分小农户无法享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要增加社会化服务的供给，单一服务主体的能力往往有限，覆盖面较窄，多元化组织形式可以发挥各主体的优势，不同地区可以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服务形式，及时满足小农户的各类服务需求。此外，政府可以考虑在作业环节实施补贴，降低小农户使用社会化服务的成本，从而刺激小农的隐性需求和增加社会化服务的提供。

第四，充分发挥专业大户的带头作用，积极带动小农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针对大户不愿意扶持周围小农的现象，建议在对大户进行的各种政策扶持过程中，增加扶持带动小农的限定性条件。此外，大户因经营亏损出现的“跑路”现象容易导致流转土地农户的农业生产受损和收入下降，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建议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基金，并对涉及农户数量过多的超大规模经营户进行风险管理。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

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信

郭书田

胡锦涛总书记：

您好！

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我们几个老党员，农业战线老兵，想向您谈一点我们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想法和建议。

“三农”问题是长期二元结构的积存，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凸显出来。突出表现：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近 20 年的农民收入年增长率一直在 5% 上下徘徊，而城市居民一直在 10% 以上，1990 年二者相差 2.2 倍，2000 年相差 2.8 倍，2006 年扩大到 3.3 倍。如果考虑到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种福利和公共服务，其实际差距在 6 倍左右。二是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脆弱，后劲不足，增长乏力，全国粮食总产持续八年的恢复性徘徊、耕地面积锐减，粮播面积走低，灌溉用水无增，实现 2020 年粮食总产 6 亿吨的难度很大，而且水土流失、荒漠化以及化学品对土壤与水体的污染严重，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农村人口持续增加，富余劳动力转移滞缓，2006 年农业占 GDP 的比重已下降到 11.7%，但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大，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现代化目标难以实现。我们以为，“三农”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症结唯“积劳成疾”，需要“对症下药”。

与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工业化的资金主要靠农业积累，改革开放前的 25 年间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以约 6000 亿元支援了工业建设；近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措施，而农民负担仍然很重。2003 年农民“所负担的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和缴纳的车辆购置税，以及农民在日常消费中负担的增值税、营业税、储蓄存款的利息税，大体为 4788 亿元，占农民总收入的 14.3%。”

（国家税务总局，2007）如果加上当年乡镇企业上缴的 3130 亿元税金，合占农民收入的 24%。而当年国家支农款 1134 亿元（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 5.4%），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 1250 亿元，二者合计不到农民税赋的 1/3，实“取远大于予”矣。且农产品的国内和出口补贴上也很少，而发达国家数十倍于我国。农村大量的资金通过各种金融机构“农转非”，流入城市，而农民贷款难问题难以解决。半个世纪里，“三农”长期支工支城而“积劳成疾”，以人均不到 500 美元的收入，很难扩大再生产，更难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主体。“三农”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三农”需要修养生息，需要大幅度增加“反哺”资金，真正做到“多予少取”。

关于需要“对症下药”问题。在农业生产要素中，土水资源短缺，劳力过剩与素质不高已是刚性约束，新增资本又如“杯水车薪”，三者都有很强的滞惰性，唯“第四”生产要素——“经营”可能作为

改变全局的突破口。

在“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使农业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改“以粮为纲”为“多种经营”，并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增加粮食进口，让农民“修养生息”，力挽狂澜地使“三农”重现生机。1980至1990年的十年间，粮食总产由3.2亿吨上升到4.5亿吨，农业总产值由1923亿元上升到766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由191元增加到686元，其年均增长率（13.7%）远高于同期城市居民（8.0%）。这是我国农业历史上的一次全面、快速和跨越式发展时期。

为了深化农村经济改革，1996年中央提出了“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紧密结合”，以及以后推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重大决策。到2004年底，全国产业化经营组织11.4万个，龙头企业销售收入14261亿元，带动农户8454万个，农民增收1016亿元。产业化经营已有十年，但企业规模小，装备水平低，近一半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扶持政策不到位，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贸工农一体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但我国推进力度不足。

当前，欲激活滞重的“三农”全局和取得跨越式发展，在于开展一次农业的产业结构革命，即在发展传统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向农产品加工方向延伸和开辟能源农业第三战场，构建基础农业、加工农业和能源农业，贸工农一体化的新型产业结构。以加工农业和能源农业“激活”和“拉动”基础农业生产。

这些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下游加工拉动上游农产品生产的现象十分明显。尽管粮食生产徘徊，而蔬菜、水产、肉类的高增长势头始终不减；粮食中的玉米、水果中的葡萄也都因有强大的下游加工拉动而发展很快。如采取“以下促上”的策略，通过强化下游加工业和开拓国内外市场，可以拉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并运用市场杠杆，吸引资金。发达国家初级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生产之比为1:4-6，我国是1:0.37，加工农业在我国有着巨大发展空间。

关于能源农业。国际社会对化石能源将趋枯竭、减排温室气体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十分关注，生物质能源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替代能源。因为它能直接替代运输燃料和化工产品生产，又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是其它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所做不到的，美、欧、日、巴西和印度等都以此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推进，发展极速。

生物质能源的原料是多元的，主要是各种农林废弃物和利用低质土地种植的能源植物。美国为实现2030年以生物燃料替代30%化石燃料的目标，在每年所需的13亿吨生物质原料中，62%是农林废弃物、28%是能源植物，玉米只占6.4%（目前主要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生物质能源产品也是多元的，有燃料乙醇、生物柴油、工业沼气、成型燃料、生物塑料和生物化工产品等。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为我国“三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国的生物质原料资源非常丰富，可用于生物质能源生产的原料资源潜力约年产能10.6亿吨标煤，其中53%来自农林废弃物，其它是现有的薪炭林、灌木林、木本油料林及宜农宜林低质土地上种植的能源植物。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不与民争粮，不与农争地”。如果建设一个年产1亿吨标煤的生物质油田，年产值550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3.6亿吨，农民可获得2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和年新增收入450亿元，约需投资3000亿元。如能建设三五个这样的生物质油田，其作用和贡献极大。

加工农业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很大，能源农业更是一个市场需求极旺的朝阳产业，二者必将强力拉动

基础农业生产。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工业、生物能源工业和生物化工工业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构成了现代农业的新型产业结构，成为“以工哺农”和“城乡统筹”的产业结构基础，农业工业化、中小城镇建设、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强大推动力量。

“三农”体量大，滞惰性强，唯激活“三农”自身能量为上策。贸农工一体化和注入资金是“酵母”，增加农民收入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加温”。“三农”一旦被激活，水土资源约束可以通过技术替代；资本约束是可以在发展能源农业和加工农业中化解（目前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粮、国家电网等大型国营企业和大量民营中小企业正纷纷进入生物质能源领域）；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向新兴的生物产业及中小城镇就近转移，这盘棋就有望走活了。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建议：

1、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财政支出中从总量与增量两方面动真格，提高支持“三农”的比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与生产条件，增强发展后劲；特别是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方面，大幅度增加“反哺”投入，使“三农”得以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事关9亿农民利益而用于“三农”支出的总量、增量和比重不应再大幅低于行政管理费的支出，真正体现“予大于取”，不至于停留在口号上。

2、将农业的产业结构革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推进，高强度向基础农业、加工农业和能源农业注入引入资金，予以充分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3、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认真树立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加速经济发展的思想，并作为考核政绩与实行奖惩的依据。

4、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力度，提高农产品加工率与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率，一方面在政策上鼓励与支持各种所有制工商企业进入农村作为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并通过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更要积极支持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延长农业生产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企业，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相信，党的十七大必将在振兴中华的征途上，竖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作者：原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经济师。2007年7月24日）

重温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赵树凯

1980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谈话有两次：一次是4月2日，一次是5月31日。

关于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的谈话背景，《邓小平文选》的尾注说：“这是邓小平同志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是与万里等人的谈话，其实不然，这是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胡乔木时任分管宣传理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谈话稿由邓力群整理成。这天的谈话中，邓小平还重点谈了反对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和国际问题。现在收入文选的谈话稿，是在当初下发内部讨论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谈话，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篇幅简短，长约千字，直接谈及政策问题的主要在前半部分。如果联系当时政策纷争解读，要点有三：

第一，是对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直接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首先直接肯定了安徽省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但是，说“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问题是，哪些地方是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并没有谈，而且，用什么标准来判定适宜包产到户？有谁来判定是否适宜搞包产到户？都有很大的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也就是为后边的继续争论留了余地。接下来的激烈争论，或者说，一些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反对包产到户，就是从这里展开的。即便在安徽省，从这次谈话之后，即1980年夏天到1981年秋的争论来看，万里之后的安徽省领导人仍然严厉批评包产到户，并且在政策上严格限定包产到户的范围。这个谈话只是对于包产到户的局部的、有条件的肯定。

第二，是对包产到户质疑批评声音的回应。“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段话的着重点在于对当时集体经济在体制方向上的肯定，尤其是落脚在对于生产队作为经济主体的肯定。换个角度看，就是，包产到户之所以不可怕，是因为生产队还是经济主体，以生产队为实现形式的家庭经济还是方向。就农村经济体制本身来看，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恰恰就是对于生产队所体现的集体经济经营体制的否定，后来的发展也证明，包产到户迅速导致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土崩瓦解。邓小平在这里用生产队会还在发挥主体地位来论证包产到户不必担心，实质上是还在原来的集体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政策框架下来论证包产到户的合理性。这与万里当时的说法有很大不同，万里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离开生产队搞家庭核算，即所谓“四级”核算。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是生产队的主体

地位，还是在人民公社体制的框架下来讨论政策。从后来的激烈争论看，否定包产到户的意见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说明包产到户不符合大方向，要加以抵制或限制。

第三，是关于包产到户将来发展的看法。“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在当时社会条件和思想理论背景下，离开了人民公社体制，人们实际上无法想象什么是集体经济。邓小平在这里强调高水平的集体化，强调巩固集体经济，显然是强调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化”和“集体经济”。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因地制宜就是那里适宜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但是，这个因地制宜并没有具体的政策针对性。

这个谈话在关键时刻肯定了包产到户可以作为局部政策措施，提升了包产到户的政治正当性，但是，因为谈话的政策立场还建立在原有集体经济理论之上，所谈制度构想还局限于人民公社体制框架之内，所以，这个谈话也成为反对包产到户者的重要支持，反对者以此强调包产到户不符合发展方向，不应成为整体性政策。这说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众多中央领导人，也有一个随着实践发展逐步变化提高的过程。邓小平后来并没有再专门谈包产到户性质问题，所以并不知道认识有何变化。两年以后，文稿中出现新的理论表述，即家庭承包制度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最初是由政策研究者提出，万里、胡耀邦主导起草的文件稿接受，邓小平、陈云认同，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在包产到户政策形成过程中，邓小平这次谈话意义重大，标志一定的历史转折性。万里后来说：“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可能被注销的。”但是，对于此次谈话的作用不能简单化的理解，以为谈话是一锤定音，包产到户便进入坦途。实际上，谈话之后围绕包产到户的理论争论、政策冲突进入新阶段，依然尖锐，更加深刻复杂。正如万里所说：“5月31日，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热情赞扬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拿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包产到户”，即文件语言表述的“家庭承包经营”，是实际上的“包干到户”，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包产到户”。邓小平谈话时所说的“包产到户”，是生产队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前提下的联产承包到户。“包干到户”则以否定生产队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条件，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承包经营。从文本比较分析来看，邓小平谈话中所说的“大包干”，还不是“包干到户”，而是“包干到组”。“包干到组”显然不同于“包干到户”，因为“包干到组”还以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为制度基础，还没有根本上否定集体经济体制。“包干到户”则比“包干到组”“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突显了家庭在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全面自主权，从根本上奠定了农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进而彻底瓦解了生产队代表的集体经济体制。

邓小平谈话内部传达，是以征求意见形式进行。时任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回忆，1980年6月初，省委在巢湖市召开地委书记座谈会，会前一天晚上，邓小平谈话稿被发下来征求意见，要求第二

天开会时退回，并规定不准抄录。“次日开会，各地汇报后讨论，没有人再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但却不赞成大包干到户。省委领导说，包产到户还可以，因为还坚持五统一，还有统一分配，而大包干则是两包一脚踢，生产队一点把柄都没有了，这样农民就不听招呼了。”

虽然邓小平赞扬“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良好效果，但是，不同政策主张争论依然激烈。从社会制度性质、农村发展方向来说，这个谈话对于包产到户，否定性评价依然是主导的。也就是说，谈话内容本身为两种对立的政策思路留出了巨大空间，并不影响反对者从社会制度性质、农村发展方向上继续批评抵制。

在邓小平讲话之后，包产到户在政治上依然处于被动，在安徽省，坚持者如王郁昭等人仍然相当孤立。“1980年8月下旬，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由于受这次会议前蚌埠、芜湖、巢湖3次座谈会的影响，加之省里的领导表扬了没有搞包产到户的两个县是坚持马列主义的，意味着似乎搞了的就是没有坚持马列主义。因此，在这次汇报会上形成一边倒的现象，对已经搞了双包到户的地方形成很大压力，认为包产到户是发展资本主义，是走回头路的问题，从而否定万里年初在全省农业会上所说的包产到户是责任制一种形式的结论。”王郁昭回忆说：“从1980年4月到10月间，省里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没有发出任何指导性的部署和文字通知，只是忙于在各地开会，围剿‘包产到户’，大造舆论。”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农村改革的第一次政策突破》）

促进农民增收应成为重大制度安排

张红宇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重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发展差距。作为重大的制度性安排，增加农民收入既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农民增收面临历史最好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再次进入黄金时期，表现为增速连续多年超 GDP 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缩小之势，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多方面积极因素的共同作用。

党中央高度重视。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各种强农惠农政策的集中投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并为农民增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特别是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胜利成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借鉴。

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大大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分工分业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到 2023 年外出务工人员绝对数量已超 2.97 亿，留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下降到不足 1.69 亿。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既增加了进城非农产业从业者的工资性收入，又提升了留农从业者的家庭经营收入，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农业农村现代化快速发展。不断推进的粮食等资源性农产品区域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增加了从业者的收入，而丰富多彩的乡村特色产业兴盛，包括不断涌现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不仅释放了农业的多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也大大增加了从业者在农业内部的就业机会和集约化收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互联网+”、农村电商的发展增加了家庭经营收入中的二三产业收入，农民收入多元化的态势愈发明显。

持续多年增收夯实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2 年的 2.88：1 缩小到 2023 年的 2.39：1，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还超过了一般农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和实现均衡发展趋势明显。

要重视农民增收的挑战性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是个长期性的话题，尽管我国在预期时间内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成绩彪炳史册。但是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城乡居民收入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方面尚未真正破题。解决农民收入增长滞后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完善战略性制度安排和具体举措。

以现阶段的表现观察，除去沿海部分省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明显外，更广大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 and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面临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长期挑战表现在，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乡要素流动和平等交换尚未完全解决。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差距依然存在。三是尽管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和绝对数量下降很快，但直到 2023 年第一产业从业者仍高达 22.8%，而创造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仅为 GDP 总量的 7.1%，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于非农产业生产效率的现象仍存在。四是收入不均衡不仅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上，也表现在不同区域农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上。2023 年上海农民可支配收入约 4.3 万元，而甘肃农民可支配收入约 1.3 万元，前者是后者的 3 倍多。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任重道远。

从短期来看，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增长面临一定压力。

坚定不移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要深刻认识到，相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农民收入增长滞后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为此，要以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为契机，一抓到底，在可预期的未来，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实现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夯实基础。为此：

实施农民增收重大举措。一是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实施农民增收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二是以制定“十五五”规划为契机，探索制定“农民增收十年行动纲要”，设定相关指标选项，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结束后，接续相关政策、资金、人才和各种资源要素，保持政策不变、机制不变、办法不变，明确责任，明确要求。三是在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相关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布局中，强化增加农民收入的相关举措要求。四是建立完善保障农民收入增长特别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考核监督检查机制。

实施区域倾斜发展政策。一是瞄准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强化对这些区域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的建设力度，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创造农民就业增收机会。二是采取差别化、多元化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税收减免、欠发达地区特殊专项等政策，创造农民增收的良好外部环境。三是加大以收入保险为支柱的财政补贴力度，探索以种粮农民种植粮食面积或提供商品粮数量核定收入补贴数量的方式，大幅度提高种粮补贴占粮食生产经营从业者收入比重。

坚定不移推进城镇化发展。一是从全球经验和我国城镇化推进实践看，我国的城镇化率最终可能会达到常住人口 85% 左右。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实现过程，也是客观规律，为此目标要坚定。二是坚持多元化的城镇化布局，现阶段要将发展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作为重点，推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加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容量，促使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均衡，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相当，生产经营收获相当。三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配套措施，并在城市享受与市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以农民工群体为重点，解决其稳定就业、住房安全、子女教育等重大关切，实现由常住人口城镇化向户籍人口城镇化转变。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是采取多元化增收策略。粮食、棉花、油料等资源性农产品生产要走规模

化、专业化、区域化道路，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和服务规模化经营，提高从业者的劳动生产效率，增加从业者的规模化收入。二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生产。通过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特色产业发展，提高特色产业的就业容量与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从业者集约化收入。三是大力发展乡村产业。通过农产品加工业、观光旅游休闲农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产业以及“互联网+”等新业态大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在农业内部的就业机会。四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维护生态链。通过延链、强链、补链的行为举措，增加从业者收入。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接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关制度、政策保障体系，最大化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二是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务投入，减少农村居民用于教育医疗方面的开支，降低农民生活成本。三是不断完善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补助水平，让农民群众有充分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来源：中国农村网）

释放农业绿色发展新动能

金书秦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要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绿色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稳产保供、增收共富的内在要求。确保农产品供应和质量、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大水大肥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生态环境保护需要，也很难给农业从业者带来可观收入，必须坚决摒弃。农业受水、土、光、热等资源影响明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用绿色生产方式让优良土地产出品种丰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在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 and 质量安全的同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的鲜明体现。我们建设农业强国，既要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体现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共同特征，又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彰显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要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传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智慧，体现减排固碳、和谐共生的时代之需。

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使用生物饲料、生物肥药、农业疫苗、可降解农膜逐步取代传统的饲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将有效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大幅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促进劳动资料迭代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农业领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条件，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2 万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随着收入增加，城乡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乡村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场所，乡

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日益凸显。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为城乡居民营造优美的乡村环境、提供绿色优质的农产品，有助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农业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农业绿色发展进展明显。

促进农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2014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农业环境保护领域第一部国家级的法规。2015年，原农业部印发《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这一具体问题，细化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同年，原农业部等8部门印发《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提出建设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这成为指导农业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21年，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农业绿色发展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强调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耕地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全国耕地平均等级达到4.76，比10年前提高0.35个等级。农田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比10年前提高0.05。在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化肥年用量从2015年的6022万吨下降到5000多万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8%，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8%，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以上，相比10年前均大幅提升。同时，绿色产品供给水平有效提升，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到7.8万个，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稳定在97%以上。

把农业绿色发展不断推向深入

尽管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基底还不够牢固，实现全面绿色转型任重道远。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采取有力措施，把农业绿色发展不断推向深入。

一是尊重农业绿色发展规律。推进绿色发展的本质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种粮畜牧必然产生秸秆粪便等副产品，针对农业副产品，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找到合理利用出路，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生态良性循环。此外，农业绿色发展包括“去污、提质、增效”3个方面，去污就是实现生产生活过程的清洁化，提质就是实现生产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增效就是逐步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提升乡村多元价值。各地必须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既不能“开倒车”，也不能搞“一刀切”。

二是创新市场化手段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过程将带来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和作物秸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减排红利，农产品品质提升的质量红利，农村环境改善的生态红利。要挖掘农业农村多元价值，通过生态补偿，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等手段，将红利变成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要加快先行先试，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见效，为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探索新路。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部门协同，特别是加强农业农村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的会商联动，在施肥、用药、作物收获高峰期就污染管控等事项加强沟通协商。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继续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更加体现绿色导向。综合应用补贴、试点示范、工程项目等手段，引导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探索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化肥农药减量、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和农药包装回收等行为挂钩。持续强化政策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总结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经验，在更大范围复制和推广先进模式、创新举措。

四是提升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巩固拓展已有成效，持续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立收集利用处理体系。投入品管理要更加注重科学、精准管理，实现从减总量向优结构转变。废弃物利用方面要更加注重高效、清洁利用，避免出现二次污染或次生问题。抓住生态循环“牛鼻子”，推广种养循环模式，顺应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强链、补链、延链。推行绿色技术发展复合种养促进农业经营主体内部自循环，以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为重点畅通种养产业间循环，通过延长农业副产品利用链条等实现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

（作者：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来源：经济日报，2024年9月12日）

生计，生境，生活

——边寨田野笔记

段 颖

拂晓，住家阿叔开着三轮摩托，将自家种的蔬菜运到集镇上售卖，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旅游开发之前，勐景莱大部分村民都以务农为生，从最早种植水稻，到后来的橡胶，再到如今的火龙果和苹果枣。无疑，从稻作到经济作物，预示着村民逐步被卷入市场，平添许多不确定因素，希冀间夹杂着不安。阿叔几年前改种火龙果，从租地、育苗到施肥，投资了十几万，前几年价格还不错，但种的人渐渐多了，价格自然往下走，由不得人。田野最初，我们跟着阿叔去过他家的火龙果地，离村寨不到两公里，现在正是火龙果收获的季节，大概半个月可以采摘一次，阿叔家里忙不过来，雇了几位阿叔阿婶帮工，他们来自临沧，在附近村寨租房暂住。阿叔说，疫情之前还能雇到缅甸工人，工价便宜，疫情结束后，缅甸劳工进不来了，工价自然就涨了，没办法。采摘的火龙果当天就要送到收购站，按照品质定价，阿叔会留下一些不同品质的火龙果，在家里兜售给游客。

之前村民也种了不少橡胶树，但胶价起伏不定，2018年跌至七八元一公斤，若是算上割胶、运输费用，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村民只好搁置，另谋出路，只是偶尔去林间照看一下。2012年，打洛边境游恢复，之前曾因缅甸勐拉博彩业兴盛而一度停止。勐景莱作为边境村寨，兼具乡村风景与民族特色，渐受游客青睐。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顺势而为，推动村寨景观打造，集传统村落保护、田园风光、热带农业以及休闲旅居为一体，直接将村寨转变为景区，村民每年可从景区门票中获得一定提成，村中一部分土地也租给旅游公司，用于景区建设，在景观营造中，还融入了傣族非遗（傣陶、傣纸、竹编、榨糖、傣锦）体验项目，部分项目并非勐景莱固有，属于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文化拼接”，在增加旅行团游客参与感的同时，也制造出一个大众易于接受的傣族印象。

旅游为村民带来收益，也悄然改变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不少村民借旅游开发之“东风”，开始自建民宿，经营农家乐。早期的民宿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傣楼中改造，在二楼隔出一部分空间让游客居住，但这样分隔出来的房间条件有限，通风、采光都不尽如人意，比较适合深度游的背包客。随着旅游的发展，有的家户开始在原有傣楼旁重新建起附楼，在房间中加装卫生间，使之达到客栈的标准。再后来，有的村民索性重建傣楼，融入不少现代民宿的元素，包括隔音、空调、舒适、美观等等。民宿的发展使旅游的前台和后台进入寻常人家，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接受陌生人的“进进出出”，习惯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与他们交流，渐渐开始用游客听得懂的方式介绍傣族的风俗习惯，如果需要，他们还能游客做上几道可口的傣家饭菜。而农家乐的经营，也在改变着村民的起居作息和饮食习惯，他们需要为傣族菜式做出新的调整，比如“孔雀宴”，一种被旅游文化包装出来的傣族宴席，又如，基本不再制作“剁生”，

因为大部分游客不吃生肉。

2016年，勐景莱的旅游达到高潮，旅行团、背包客纷至沓来，与打洛边境一日游、独树成林景区一同构成环线。村民配合公司开发，积极参与傣族村寨旅游，本身自然也被置于游客的凝视之中，成为一种关于“原真性”的文化展演。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边境关闭，旅游全线叫停，不少村内新修的客栈就此闲置，直到如今才慢慢有所起色。不过，疫情对村民的冲击没有想象中严重，虽然过去旅游开发如火如荼，但并非全民参与，很多家户仅将之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依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加之客栈都是建在自家宅基地上，也就没有太多的日常耗费和支出。但这对旅游公司影响极大，疫情中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这也迫使公司在疫情之后重新设计旅游规划，加入康养、研学等项目，这些项目似乎更加“高端”，村民参与度随之降低，获益较少，积极性自然也有所下降，甚至对如何合作开发村寨旅游产生分歧。

旅游开发，就如双刃剑，在保持文化自信、自在生活与提供旅游服务、创收获益之间，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首先，被建构的傣族文化渐渐进入勐景莱村民的日常生活，寨心、神树、佛寺、傣陶、傣纸、傣锦，这些外界对傣族文化的简单理解被旅游景观进一步固化，加之村民的参与和导游的讲解，则加深了这些脱离原生态语境的刻板印象。其次，在勐景莱，不同时期旅游开发的侧重点不同，景区旅游线路的设计，将村寨分成了“中心”与“边缘”，中心区较为旅游化，村民生活成为旅游展演的一部分，民宿、餐饮也集中于此。而在不同地段，旅游带来的收益和影响自然不同，村民对此意见不一，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再者，民族旅游，作为现代性产物，映射着城市人对田园景色、休闲生活和民族风情的想象，一旦实际情况与其期待不符，便有可能产生情绪与不满。在田野中，我们就经历了关门节期间住在村中民宿的某一游客以影响休息为由，执意要求村民停止欢聚，显然，她所希望看到的，或许并不是真实的民族文化与生活，而更似一种想象的消费文化景观，一种城市中无法实现的幻梦。

游客与东道主，来来往往之间，也在相互影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与旅行者的诗和远方相映，同样带给村寨年轻人不少憧憬与期待。村中的年轻一代，大多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将来能过上好日子。村中学习好的小孩，大多已离开村寨，到勐海或是景洪就读中学，准备高考。但是，对于村民而言，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对村外世界的理解，多少是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逐渐形成的，信息来源复杂，网络、媒体、坊间传闻，以及自身和亲朋好友外出谋生的经历等等。他们希望子女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发展，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究竟怎样，大学、专业与未来职业的关系如何，又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更多存于模模糊糊、朦朦胧胧之中。而对于更年轻的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农为生的传统农村生活太过辛苦，大抵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如今，村中的田地，多数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村民继续耕种，若是家庭劳动力不足，索性租给他人种植经济作物，留下来的年轻人，要么在村寨开民宿，要么在镇上打零工，很少参与家中农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村寨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也都跃跃欲试，但勐景莱却没有出现与内地农村一样的空巢现象，目前村中大约还有六七成年轻人留在本地。疫情之前，一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甚至去缅甸种植经济作物，也有村民从事小额边贸。疫情之后，很多人选择就近工作，如经营民宿、餐饮，售卖热带果干、旅游纪念品，或在旅游公司做导游，在镇上开店打工，或者与父辈一起，投入农业经济，主打销售和管理等等，日常生活仍然以村寨为中心。的确，多元多样的生计方式使村民有了更

多的选择，也使勐景莱成了既可以走出去，又可以回得来的家乡。“能出去最好，若是过得不好，回来也没问题”，在与村民谈及子女的未来时，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与城市年轻一代的“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绩优主义与效率至上，无形之中使教育成了“唯一的希望”，阶层跃升，不进则退。悬浮之中，新异化正在吞噬着城市年轻人的未来。

应当说，在勐景莱，村民的日子，大抵过得自由自在，除去农忙时间之外，显现出一种城市生活中难以得见的“松弛”。诚然，村民的衣食无忧自是重要，但这种松弛更来自于社群，来自于文化。在我们绘制村寨社会地图时，以亲为邻的空间布局较为常见，不少老咪涛（傣语对年长女性的称呼）都说儿女的家就在附近，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而在村中各种活动，如赙佛、建房以及红白喜事等，亲朋好友以及年龄组（打老庚）都会参与其中，互帮互助，情感归属，油然而生。更重要的是，佛教信仰为村民提供了持久、稳定的人生意义。业报积累，因缘聚会，使村民在世事变幻中不至于患得患失，这也是旅居在外的村民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一定要返回村寨，共同庆祝，布施礼佛，滴水回向的原因。反观城市，世俗生活以及社会的加速度，使人的生活愈发趋向单向度。自我与社会的疏离，使忙碌中的人甚至无法慢下来，停一停，想一想，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勐景莱的慢与城市生活的快，鲜明对比之下，值得我们细细体会。

当然，勐景莱的松弛背后，也存在着另一种持续的焦虑。一方面来自农业靠天吃饭。春种秋收，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却蕴藏着诸多的不确定。村民与我们谈到，种地最怕天气不好，尤其是水果种植，倘若开花时节暴雨不断，花粉被打掉了，自然无法结果，就意味着今年颗粒无收。八月初，阴雨连绵，成熟的火龙果无法采摘，时间长了就会烂在地里，又给村民带来不少担忧。另一方面来自市场与国家。经济作物，价格源于市场，自然会被卷入供求关系的浮动之中，非个人之力能够掌控，因此，何时种植何种作物，投资多少，村民一定程度上也在承担无法预估的风险。再就是政策的变化，田地可以种什么，能种多久，不同类型的土地又如何管理，耕地红线与农民收益如何平衡，政策出台，或许初衷是好，但如果不能切合实际，直接受其影响的则是村民的切身利益。一天深夜，和村中一位阿叔聊天，他刚刚从火龙果收购站回来，最近火龙果丰收，大家都忙着采摘，收购站里排起长龙，对果农而言，盛产影响价格，不见得就是利好。他一边躺在椅子上休息，一边说到，“国家要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但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是稳定，不管种什么，最好几年内政策不要有太大变化，不要反反复复，到头来苦了老百姓，老百姓收入不稳定，过得不安心，对国家也不好……”

是夜，雨一直下。淅淅沥沥，透着几多悲喜与无奈。

（作者：供职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来源：澎湃新闻，2024年10月6日）

“忆旧养生”使我们重现青春活力

——阅郭书田司长最近一文有感

孙鸿良

引言：

近阅郭书田老司长的“生态的源头在哪里”一文（通讯 2024 年 11 期）深感此文的厚重，需查阅多篇文献才能读完此文。又想起“忆旧养生”使我们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老研究人员通过不断的笔耕而焕发青春。“忆旧养生”一词是由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提出的，即不断的回忆往事可以激活大脑、增强记忆，且缓解老年病的症状。他最近受邀在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给退休老干部做了一场报告（2024. 10. 30），“忆旧养生与健康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使我不禁回想起了一系列的往事，这对我及同样笔耕不断的学者们确实起到了再现青春活力的作用。

一、“忆旧”一词的由来及对健康养老的启发

据称，美国哈佛大学的艾伦·朗格教授曾于 1979 年作了一个跨时代的实验研究。她在匹兹堡的一个修道院中，搭建了一个模拟 20 年前的“时空胶囊”房屋，按照 1959 年的时代特征来装饰室内的环境。研究选取了 16 位年龄在 70-80 岁之间的老人，随机 8 人为一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对照组。实验组的老人们需在“时空胶囊”内“沉浸式”生活一个星期，所接触到的音乐、电影、报纸杂志都是 1959 年的。他们还要像“穿越时空”一样讨论 1959 年的新闻时事，并按照 20 年前的习惯进行洗漱、穿衣、走路等。而比较组的老人只是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谈论或回忆 1959 年所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令人惊叹：一个星期后，实验组的老人们的老人们在视力、听力、体力均有明显改善，并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心态，手脚变得更敏捷，反应速度也更快。对照组的老人们虽也有所改善，但成效并不突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衰老可能存在逆转的可能性。因此“怀旧养生”是健康老龄化的新方向，使我们看到了重现青春活力的途径与希望。

二、笔者的几事“忆旧养生”的事例

事例一、1987 年，我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是对生态资产的极大破坏，许多学者纷纷来函提出解决方案。而在现实中，急需一批专家学者去作灾后复生演变趋势的科学考察，卢良恕院长毫不犹豫地指派了笔者去参与此次考察。

当时火灾尚未扑灭，道路不畅，只有用飞机考察与地面考察相结合的途径来进行（图 1）。灾后地面出现了一些草本与灌木幼苗，首先要对其进行辨认，这种现场的追忆就成了最好的脑力活动。我不仅需要记录苗期植物的名称，还要根据当时的生态环境预测其作为初始种群的发展趋势以及进入次生群落，进行正常演替的可能性。回想起来，这次考察活动极大地激活了笔者的大脑，使“忆旧”充分达到了“养

生”目的。本次考察还在1989年获得了林业部的科技二等奖。

事例二、2000-2002年笔者还参加了由中国工程院钱正英院士主持的“西北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草地生态考察。当时西北五省草原草地普遍退化，需要建立人工草地来加以抢救，急需多学科人员进行综合考察。卢院长又指派笔者参与此考察。西北草原的退化是过牧与干旱多种因素造成，常见贴地面的植物残体（图2）这对我来说又是一场很好的“忆旧”活动，我需要来正确辨认大量的植物残体并预测其变化（代表作1-3）。

考察中发现，当地政府建设的人工草地，多为耗资巨大、效果甚微的补水措施。例如经过草原地带内蒙古的锡盟正蓝旗时，见到一片种植中生植物“英国红”青玉米作为“人工草地”（图3），需要从80-100米的深井中反复抽水灌溉（6-8次），才能勉强获产5吨/亩青饲料（图3）。但当考察组进入甘肃省永登县时，突然见到一片红彤彤的人工草地，仔细一看竟是我们正在推广的中旱生植物籽粒苋（图4）。据当地人讲，籽粒苋抗旱能力超强，只需灌1-2次水就能适应该地区年降水量150-250mm的荒漠化草原地区的半干旱条件，成为了当地一道风景线（详见论文代表作4）。

笔者能完成上述考察任务，回想起来是得益于笔者在北大生物系任博士生学习期间，受导师李继侗老先生的指导。他主张少呆在图书馆跑书本书，多到田间草地实地考察。所以，他当年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下森林与草原地区进行植物种群结构现状与演替趋势的生态学定位研究。后来他让我参加了中科院综考会主持的黑龙江省落叶松林与干草原地区种群生态现状的综合科学考察，使笔者早先就具有较强的识辨植物幼苗及其演替趋势的能力所致，因而才能完成以上两项任务。

事例三、从2013年起，笔者一直从事籽粒苋的引种、驯化、产业化研究，并与众多科研单位及企业家合作。例如，在山西西部朔州地区的露天煤矿区的三年复垦地上种苋，居然只灌水两次而获得成功。而在旁边空地同天种植并灌溉的空地上播种玉米等作物都久久不出苗或出苗后生长缓慢，远看只见一片空地（图5）。由于籽粒苋是从美国茹代尔（Rodale）有机农业中心引进，原产地为南美，需首先了解其原种在南美的生长条件、食用及饲用状态而必须查阅大量有关文献来参考。因此多查文献也增强了脑力，成为“忆旧养生”的有效途径之一（代表作5-6）。

三、结语

笔者在郭书田老司长创办的“通讯”中看到多篇论文，深受启发。“通讯”自创办至今已有400多期，给了退休的老司长、老学者等一个继续发挥余热的平台。笔者也陆续在“通讯”上发文10余篇。郭司长40年如一日的写稿并审稿，还接待来访者，笔者等2019年10月18日访问他时（图6），见他精神焕发、脑力活跃，而今时隔5年仍坚持不离岗位，多有论述，著写了众多带有大量文献的文章。这说明，查写文章确可活跃脑力，身心也为之健康，也可谓是青春活力的又一个受益者。

（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2024年11月）

附:

笔者论文代表作

- 1、孙鸿良 西北地区农牧业发展方向的探讨《草业学报》2003 年 12 卷第 4 期: 1-6 页
- 2、孙鸿良 内蒙古中西部草地整治与建立节水型饲料作物基地探讨《中国生态农业学报》第 13 卷 3 期, 2005 年 7 月: 6-9 页
- 3、孙鸿良 我国北方地区扩大林草面积的成功模式及其纳入草地生态农业体系的生态学依据《中国生态农业学报》第 17 卷 4 期, 2009 年 7 月: 807-810 页
- 4、孙鸿良 宁夏农牧业发展方向与草地农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农村生态环境》2004 第 20 卷第 2 期: 68-71
- 5、孙鸿良 钱学森老院士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在我国苜蓿产业蓬勃发展中得到了验证《中国种业》2015 年第 3 期: 9-12
- 6、孙鸿良等 籽粒苜蓿饲料喂饲畜禽的增产节粮双赢的现象及其营养功能效应《中国畜牧业》2019 年第 21 期: 29-31



图1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由林业部主持了“恢复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用飞机考察与地区考察结合，笔者参加了考察。这是一场需从辨认灾后复生植物幼苗开始的“忆旧”考察，笔者身旁为水土保持专家关君蔚，完成任务后于1989年获林业部科技二等奖。



图2 2000-2002年由钱正英院士主持的“西北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笔者参与了西北五省、自治区的草原与荒漠地带的植被考察。当时西北地区草原退化严重，经常是干旱与过牧带来的荒凉一片。此为宁夏桥湾的荒漠化草原上草群低矮的现状，笔者与钱正英（左1）等一起考察（2001.5.18）



图3 此为2001年8月路经年降水量400mm的草原地区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正蓝旗的乌伦戈查250亩的青玉米喷灌地，通过管道移动已喷灌6次水，这种高投入多消耗如同杯水车薪，仍达不到亩产5吨的要求，说明建立适宜的人工草地（或饲料地）选用草种为第一重要生态技术。



图4 考察队于2001年9月经过甘肃永登县时发现大片的荒漠化草原上种植成功的籽粒苋（K112），在地处降水量300mm地区，籽粒苋只需灌水1-2次即可完成亩产5吨的需求，证明是可供选择的适宜草种之一。籽粒苋K112是笔者从美国Rodale有机农业中心引回的人工杂交种，经国内精心培育而推广。



图5 中煤公司在山西朔安露天煤矿的三年复垦地上种苋成功（右），平均株高1.8米，而同日播种（2016年5月10日）的春玉米（左）则久不出苗或出苗很低矮，生长缓慢，只见一片空地。曾同样施过2方/亩有机肥与灌两次水，在复垦地上种苋不仅获取了粗蛋白较高的（平均可达17-21%）的优质青饲料，还因其具发达根系而起培土作用。



图6 2019年北京中煤公司初克森（左），新疆牧粮实业公司井洋（右）和笔者一起访问了郭书田老司长（中）。井然汇报了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种苋成功，曾用洗盐水灌溉，3个月后可生长2.5米高，用于养驴。他很重视地询问了众多问题，表现脑力充沛、身心健康。时过5年现今居然还在通讯上不断发文，可见“忆旧养生”对其也发生了焕发青春活力的作用。

黑龙江养生村，地里全是活了几百万年的神奇药植，太低调

超级乡村研究员

在地球上，人类尚未存在之前，植物早已扎根于此。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旅程中，我们学会了利用植物来满足基本需求，如食用植物果实填饱肚子、使用植物纤维制作衣物、利用植物材料建造住所等。其中，一些植物具有特殊的治疗作用，能够缓解甚至治愈疾病，这些具有医疗价值的植物被称作“药用植物”。

使用自然界的植物作为药物并非中国所独有，但能够发展出独具特色且系统化的医学理论体系，并持续传承至今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据传，神农尝百草，首创医药，被尊为“药皇”，这标志着中草药的最早起源。

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目前我国已知的中药资源种类超过 1.3 万种，其中有上千种是中国的特有品种。从湿润的东部季风地带，到干旱的西北地区，再到寒冷的青藏高原，中草药遍布华夏大地。

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的一个小乡村，“寒地中草药小镇”正在崛起。

元明村，地处勃利县勃利镇西北部，境内道路宽阔平整，植被丰富、品种繁多。这里三面环山、地势低洼，大部分是山坡地，适合种植中草药。

种植中草药之前，元明村的地势条件让村民们吃过不少苦。三面群山环绕，地形低平，经常遭水患，依靠种地为生的村民，常年看天吃饭。

既要突破困境，又要振兴乡村，还要让村民愿意干，在土地里种什么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2018 年，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彦龙来到勃利县挂职副县长，作为一位在天然药物化学领域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张彦龙发现，曾经让元明村村民饱受灾害的地形、气候和土壤，实际上非常适宜中草药的生长。

经过充分调研后，元明村“寒地中草药产业”的目标就这么定下来了。

祖祖辈辈都在地里种粮食，现在让他们去种中草药，许多村民一时难以接受。村党支部书记韩停国便带领村委挨家挨户宣传政策，讲受益，慢慢地，村民们都放下了心。

2019 年初，元明村 7000 亩的土地流转给了中药材企业和合作社，用于种植黄芩、五味子、刺五加、甘草、桔梗、板蓝根等中药材。

签订的流转合同期限长达 9 年，每亩土地每年的费用为 600 元，企业一次性结清 9 年的费用。

不仅土地流转拿到了钱，在中药材的种植和生产上，药企、合作社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原来需要外出打工挣钱的村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有工作机会。

2020 年，元明村 10340 亩耕地全部实现流转，都种上了中草药。村集体每年利润可达 82.5 万，从中拿出 70% 为百姓分红，每户可分得 1500 元左右。

如今，在元明村，中草药种植面积高达 12 万亩，现有药材 10 余种，如百合、黄芩、桔梗、五味子等。

除了与药企合作，勃利县还在网上搭建了中药材交易中心，元明村的中草药种植户们在家里就能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2019 年，元明村被评为“黑龙江中医药特色小镇”。

2020 年，元明村以“寒地中草药小镇”的身份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二届中医药博览会，展台上的各种精致药膳，如生煎沙参、芝士百合松仁、黄芪灵芝瘦肉汤、林下参黄精炖鸡汤……让元明村结结实实的火了一把。

除了药膳，如今在元明村的“寒地中草药小镇”，还有温泉、民宿。

远眺元明村，只见它隐匿于绿水青山之中，白墙灰瓦的新中式民宿与四合院式楼房错落有致，给人一种江南水乡的错觉。

为什么要在北方的乡村里建起徽派风格的民宿？

原来是因为神医华佗。安徽亳州，是华佗的故乡，也是我国“四大药都”之一，这是元明村选择徽派建筑作为民宿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看起来十分气派的民宿，之前都是村民家的老房子，地势低洼，每到下雨天许多房子都会遭水淹。村委会将这些老房子从村民手里征收过来，改建了民宿。拿到赔偿款的村民，有的住进了村里的新房，有的则选择去了县城买新房。

围绕中草药，元明村已形成种苗繁育、种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康养旅游的全产业链，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通过土地流转，村民每年可通过每垧土地获得 9000 元的收入；承租这些土地的企业在种植和田间管理中药材时，优先考虑雇佣当地村民，使得每位农户平均每年能够增加 6000 多元的收入；对于那些处于低洼地带的村民，通过转让他们的宅基地和经营民宿，平均可以获得大约 10 万元的收益。

除此之外，每到年终，村民们还能享受到土地流转用于药材种植以及寒地中草药小镇经营所得的利润分红。在寒地中草药小镇的建设及试运营阶段，村民积极参与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人均增收达到了 2 万多元。

畅玩中药材花海，品尝地道的药膳，享受温泉药浴，住特色乡村民宿，体验一段养生的惬意时光……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美丽乡村图景正在缓缓展开。元明村，这个因“药”而兴的小村庄，正逐渐被世人知晓。

【参考资料】：

- [1] 七台河勃利元明村，因“药”闻名的小村庄
- [2] 元明村寒地中草药小镇
- [3] 七台河元明村：中草药种出致富“良方”
- [4] “八月的乡村”富民强村采访行 | 元明村：寒地中草药铺就乡村振兴美景

（来源：超级乡村研究所，2024 年 8 月 31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